

黄道婆的历史评价及文化影响

冯衍甫

黄道婆是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伟大而平凡的历史人物，她与海南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说熟悉，应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里都提到黄道婆，每个学生都知道黄道婆是我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女纺织家，她为中国的纺织技术革新做出了卓绝的贡献。说陌生，是因为历史资料上有关黄道婆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中国是个很看重史志的国家，自司马迁作《史记》以降，盛世修志，已成传统。在卷帙浩繁的正史之中，没有黄道婆的蛛丝马迹的记载。《元史》有 47 本记、6 表、97 列传和 53 志之滔，却见不到有关黄道婆事迹的只字片言。到明清之后的一些地方志上才见到一些追述，但也十分简略。

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记载黄道婆的文字，最早的是元代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四中的二九七条《黄道婆》，以及元代诗人王逢的诗《黄道婆祠并序》。陶、王的诗文文字不多，兹录如下：

黄道婆

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硠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推弓之制，卒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姬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姬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黄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四）

黄道婆词并序

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家。及卒，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辞曰：

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
 道婆异流辈，不肯崖州老。
 崖州布被五色纛，组雾紉云灿花草。
 片帆鲸海得风归，千轴乌泾夺天造。
 天孙漫司巧，仅解制牛衣。
 邹母真乃贤，训儿喻断机。
 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
 荒哉唐元万乘君，终膺长衾共昆第。
 赵翁立祠兵火毁，张君慨然继绝祀。
 我歌落叶秋声里，薄功厚殓当愧死。

(王逢《梧溪集》卷三)

陶、王的诗文，是最早记述和咏颂黄道婆的文字，是历代人们悼念和研究黄道婆的唯一依据，此后的诗文大都由此派生。

从陶文、王诗的记述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黄道婆的事迹和贡献，是人民群众怀念和感激黄道婆；洒泣共葬之，而建祠立庙，才流传下来的。陶、王两人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他们的这些墨迹，那乌泥泾的黄道婆祠庙中的香火只能徒然缭绕，老百姓的思念将在历史的风吹雨打中淡化，一个世界级科学家的杰出贡献和功绩将被现代化工业轰隆隆的机鸣声所淹没，黄道婆的英名也将永远湮灭在历史的山重水复之中。当年陶宗仪就慨叹道：“日渐泯灭无闻矣。”正是他和王逢的烛火，把黄道婆的光辉形象永远地映照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陶王的诗文，记述黄道婆于上海与海南之间的“一去一回”。这“一去一回”简明地记述了黄道婆一生的主要经历，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杰出的纺织改革家的成长历程，及其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让我们这些600多年之后的子孙深切地感受到她给我们带来的无比温暖。

可惜的是，陶宗仪和王逢的记述都实在是太简约了。连黄道婆的姓名、生平、生卒年庚等都没有记录，给后人的研究评价留下一个又一个迷团，引发出诸多的争议和存疑。

黄道婆神也，人也？

由于黄道婆的事迹是因为人民群众建祠立庙才流传下来，由于明清以降，张之象、包世臣等人不断“神化”，相继建庙立像以奉祀，把黄道婆称之为“先棉”“黄

母”等，香火不断，于是，后代的人们不禁疑问：黄道婆孰神孰人，是史实还是传说？对此，国内外的一些人，甚至是学者，他们认为黄道婆流落崖州及“自崖州来”，只是人们演绎出来的故事。“黄道婆的事情即使实有其事，也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事，不能以此来概论江南或者整个中国。”还认为“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因此，黄道婆的故事属于传记型的传说，是人们把她尊为“先棉”，如同西陵氏被尊为“先蚕”一样；被作为在纺织生产领域中崇高的神圣来礼拜。”

由于黄道婆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一位普通的老百姓，出身“微贱”，在卷帙繁多的正史之中，便没有她的位置，连蛛丝马迹也寻觅不得，其历史地位及伟大贡献便遭受人们的质疑。这并不是黄道婆的过错，而是元明以来的那些“正人君子”，史家学者们应当担当的历史责任。他们只知设司布署，征税收赋，招贡募课，竟然不闻根源，不尊贡献，不究功名，不追业绩，这就让我们这些后人予以嘲笑和责问了。

黄道婆的杰出事迹和历史贡献，受到老百姓的感恩和爱戴，建祠奉祀，延绵的缭绕香火，才使她的英名及其伟绩流传万代，让我们对她肃然起敬。由于史料的匮乏，人们的争论不休，自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把老百姓出自由衷的敬仰和报恩，用他们特有的而且是唯一能用的方式，推崇出来的极其平凡又极其伟大的人物加以漠视，这就不能不说是劳动人民群众的良善和意愿的一种亵渎，是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群众力量的一种轻慢，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管视。

对此，学者黎兴汤先生等以大量史实及文物说明，黄道婆乃实有其人。不少对历史有责任心的专家学者也都以唯物主义史观对这位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予以认同，对这一位平民百姓、劳动妇女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从而确定黄道婆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黄道婆在棉纺织史上的革命，做出了高度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黄道婆称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黄道婆的纪念祠庙，屡毁屡建，这里的袅袅香烟，绝没有一丝半点的神祇的膜拜，纯粹是一种敬仰和怀念。正如中国老百姓供奉自己的祖先一样，只有虔诚的纪念，是对她与他们的冥冥之中的在天之灵的一种纯

净的感念。这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中道教文化的一个传统特性，它与民间传说和神仙故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中国的道教文化中的许些被称为神仙者，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真实人物。由于他们对民族、对社会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和贡献，老百姓把他们奉为神仙，供以香火，岁享朝拜，意为寄以最崇高的敬意，以为精神世代相传，世代相继而别无他意。道家鼻祖李聃，也称老子，就被尊为太上老君。李白、关羽、岳飞、林默娘（妈祖）等，都被奉祀为神圣。中国老百姓从来总是从道德观点出发，从崇敬心理出发，从精神传承出发，从构建“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出发，将许许多多历史上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当作圣人贤者来建祠奉祀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人性化和人民性的特征。

黄道婆是松江女，还是海南妹？

从陶宗仪和王逢留给我们的文字中，我们大略地知道黄道婆的生平行踪。小时候，她就流落到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州，学习棉纺织技艺，从黄四娘成为宋五嫂，最后成为黄道婆。老了，才回到乌泥泾，给乡人传授棉纺织技术，并革新了棉纺织工具，让上海县一带兴旺发达起来。

陶文王诗，虽然点燃了黄道婆的巨烛光辉，但是，他们留下的遗憾也很多，黄道婆的身世就是诸多迷团中的一个。

黄道婆究竟是何方人氏？

普遍的说法，认为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属今上海市）人。但是，也有人说，黄道婆是海南人，崖州黎家妹。

1987年出版的《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集有篇题为《黄道婆籍贯考辨》的文章称：“黄道婆，原籍崖州，是位黎族妇女”。

2004年出版的《海南旅游导趣》一书也明确地指称：“黄道婆是崖城的水南村人，……她晚年时，还应请前往广东的潮汕和福建、江苏等地传道授业，因年高客死于江苏境内。”

三亚市崖城镇文庙的文本也言之凿凿地说：“黄道婆是海南崖州人，……晚年赴上海松江传播先进技术。”

对于黄道婆的籍贯，我们应当尊重历史记载。

王逢第一个认定黄道婆是上海人。他在《黄道婆祠

并序》一诗中，开篇就说：“黄道婆，松之乌泾人。”王逢与黄道婆是年代很相近的人，曾住在乌泥泾，他的这番话是黄道婆仙逝数十年之后写的，他的话，可信程度应当说是很高的。除王逢以外，《嘉庆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松江府志》和清人褚华的《沪城备考》，以及后来的《龙华志》均有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人的记载。历代的黄道婆祠的祠序，也都记载黄道婆是乌泥泾人。1994年出版的《黄道婆研究》一书中录载不少，这里就不一一枚举了。

反观广东和海南方面的史料，历代的《广东通志》《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海南岛志》等，都没有黄道婆是崖州人的记载，就连纂集颇详的《崖州志》，也没有黄道婆是本地人的记述，而只是在“杂志二”的遗事条中，转录了陶宗仪的《黄道婆》原文。并且这一原文列同李德裕、丁谓等谪官贬臣和流寓人物的轶事一起，而不列在崖州本土人物名贤篇中。

从上面所说，黄道婆的籍贯应当是很清楚的了。但是，就王逢的说法，与陶宗仪的说法仍有出入的地方。王说道婆是乌泾人，陶说道婆自崖州来。陶王两人居住相近，过从甚密，又相互奉重。既然王逢已明确认定黄道婆是乌泥泾女了，为何后来成书的陶宗仪不作明确的更改和认定，而保留原样流传下来呢？难道是陶的一个笔误么？而上面所说的志和祠序所载，应当说都是从王逢那里相承面来的。

说黄道婆是海南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一个黎族老年妇女，言语不通，习俗相异，说她能北上闽粤江浙传艺，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多了。

故且将这个籍贯问题置搁起来吧，也许后来的研究和发现会把问题说清的。

关于黄道婆学艺的师从。

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篇名人名作说，黄道婆到海南黎族地区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这一说法几成史学界的定论，于是所有辞典、教科书、文论等文稿，都一个腔调地人云亦云。这是对海南不堪了解的一种臆说，造成了以讹传讹。

众所周知，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他们在这里生活了数千年，一直处于原始的自为的生活形态。后来，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大量迁入，加上封建统治者一朝甚于一朝地对黎族人民歧视和迫害，黎族民众被迫一步步退居五指山腹地。到了隋唐之时，冯冼氏平定海南之

后,海南的民居就一直处于汉族在四周平原,黎族居腹地山区的状况了。

黎族所居之地,环境十分恶劣,明清时海南一官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山中瘴气甚厉,入者非死即病,无能为役也……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郁而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在水,莫不有毒。入山者身受火热,气喘汗出,阳发于外,腠理不密,风之寒者,浸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肠、胃、肺、腑,其不病而死者,几稀矣!”

如此险恶之地,其语言不通、习俗差异极大,一个十二、三岁的江南少女,能居住到那里吗?

那么,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是落于何处呢?崖州几经变迁,宋初崖州指的是海南岛,明时的崖州才指三亚。而陶、王两人称的崖州,会是指三亚而不是泛指海南吗?如今普遍的说法,是说黄道婆当年沦落就落在今三亚市崖城镇的水南村。

这一说法无不有其道理。水南村几经是郡县之治,是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的冼夫人的开府之地。这里很早很早就住有许多贬官谪臣,戍边士兵、迁徙流人。流放到崖州的15位贤相名臣学士之中,有10人就住在水南村。这里的人以汉民为主,操有6种语言,其中一种叫“军语”,与黄道婆家乡的江苏语言相近。水南村附近时有个大港口叫大蛋港,很早就是海南对外交往的港口之一。水南村又是一个丰饶的地方。故此,黄道婆南来,挑选水南村居住,向海南黎汉各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一直至今日,黎族没有织机。黎族的纺织是腰织,就是一把丝线一头缠在树身上,一头缠在腰间,席地而坐,进行织布,这与黄道婆在海南所学差异甚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她并非直接师从黎族,而是向海南各族人民学习先进纺织技术。

其时,海南的棉纺织技术,处在全国领先地位。究其原因,一是黎族很早就懂得纺织“吉贝”(即棉布),黎族妇女的花织、色织、杂染技术十分高超。如今,黎族龙被等棉织品留传下来的图案达120种之多。黎族人民高超的棉纺织技术为海南纺织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二是海南是个移民岛,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中包括贬官谪臣、戍边士兵,商人流人等带来了全国各地的

丝、麻、棉等纺织工具和技术。海南的纺织博采众家,融会贯通,其技术之高超便早就居于全国之首了。海南各族人民纺织棉布,以棉布为衣、为服,很早就十分普遍。“贯头”卉服便是棉布衣服。汉朝太守孙幸横征暴敛,强征民间广幅布,以进贡朝廷,激起民变。这广幅布就是棉布一个品种。可见海南乃是一个纺织圣地,具备把黄道婆培养成纺织大师的充分条件。

黄道婆在海南留居约37年,学成之后,由于战火焚烧,兵荒马乱,她不得不再次漂洋过海,鲸海而归。回到乌泥泾,“教他姓妇不倦”;“仰食者千家”;“人既受教,家既就殷”。黄道婆掀起了“棉花革命”,推动了江南乃至全国棉纺织的发展,推动了江南600年的兴盛。

黄道婆掀起棉花革命,主要是改革创造了一套“擀、弹、纺、织”工具和为乡民传授了棉纺织技术。工具革新有:

一是用踏车去棉籽,代替了手剖去籽。踏车是一种手摇脚踏式的轧棉机,又称搅车,可一人操作。它比元代王祯《农书》中需二人手摇的轧花机有了明显的进步。比美国人维特尼发明的轧绵机早了500多年。

二是当时内地普通用一尺多长的小竹弓来弹松棉花,费时费力,效率很低。黄道婆不仅把小弓改成四尺长的大弓,用绳统,而且还用檀木做了椎(槌)子击弦弹绵。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弹出的棉花也均匀细致,提高了纱和布的质量。

三是发明了脚踏三锭木棉纺车,又称黄道婆纺车。这种纺车轻巧省力,功效倍增,是黄道婆对纺织工具上的最重要贡献,比欧美等国早了400-500年。

四是黄道婆利用当地已经成熟的麻织布机和丝绸织机以及轻架、纬车等工具,对乌泥泾的棉织染工艺进行了改革,她所制作的织布机不仅仅限于平纹织机,还有提花机,能够“错纱配色,综线挈花”。

黄道婆在棉布的织造和印染技术方面同样有杰出的建树。她把黎族等海南人民较先进的棉布染织工艺技术带回家乡推广,又借鉴和吸取海南人民织造“崖州被”的经验和方法,发展汉族民间固有的传统工艺,讲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技法,织出带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图案,制作精美的“乌泥泾被”等产品,享誉内外。

王逢称赞说:“道婆遗爱在桑梓,道婆有志覆赤子。”明张之象称:“杼轴不空,民以康义。”清人包世臣

在他的《新建黄道婆专祠碑记》中赞道：“黄婆诞降，至正之初，自崖州附舶至乌泥泾，教民纺织，棉始为布，化行若神，法传松、太。近世秦、陇、幽、异，转传治法，悉产棉布。”“山梯海航，贸迁南北。”“士与民仍得各安生业，称东南乐土。”

王、张、包等人的称赞并不言过其实。黄道婆的贡献，确是让“民食不给”的松江变为“民以康义”，让江南“山梯海航，贸迁南北”，“百镇兴盛，数百年繁华。具体是怎样的一种变化呢？

一是江南农业生产形成“稻三棉七”的格局。松江进地区本就“土田硗瘠”，虽道婆归乡之前已有不少人“图谋树艺，以资生业”，无奈“厥功甚艰”，棉布质量很差。黄道婆归教之后，“人既受教，竞相作为”，农业种植由原来以粮为主，转为以棉为主，不少地方“稻三棉七”，更甚者“棉九稻一”。棉与布“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这种生产格局的变化，标志着江南一带已由小农生产转向商品生产。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黄道婆传播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之后，江南地区经济已逐步发展成为“全赖花布贸易”，这就使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形成了“棉—货币—粮食”交换对流的新形态。江南农民由以织助耕，变为耕织并重，甚至织重于耕。他们或耕或织，或农或工，农商兼顾，甚至或商或企。由此，上海地区成为最富庶的地区。

二是手工业的兴起促进市场繁荣。黄道婆从织具的革新到织艺的传播，已形成了程序化的手工生产工艺，是一种大众化生产的大众化商品的工艺，使中国人的穿衣问题在原来的丝麻葛褐上增加了棉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的穿衣问题。随着人们的创造与发展，棉布品种从明时的8种，发展到清时的20多种，产量也

大幅度增加，已远销外埠，甚至远销欧美。商品生产的形成，促进了江南地区市场繁荣。

三是市镇的繁荣带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壮大，培育了上海地区集镇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如上海县境，宋元期间只有乌泥泾、吴会、七宝等镇，迨及明清，又崛起龙华、三林、诸翟等大小四十余个集镇。嘉定县同样如此，大小集镇兴于明代，繁华于清代，有“金罗店银南翔”之称的罗店、南翔时为江南巨镇，人口户口都逾万。尖塘镇、无锡等被称为“花布码头”。南翔镇大小店铺400多家，粮—花—布的对流十分繁盛。商业的繁荣，也扩大了集镇的功能，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十分活跃。

四是内外贸发展让江南崛起。江南棉布业迅猛发展，品质优良，远销关内外，仅上海县城里的85家商号，道光十一年（1831年）发售棉布4.001万包。道光二十四年，从华北、东北输入的货物价值一千万银圆。包世臣说：“关东豆类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

16世纪起，中国棉布远销南洋诸岛、日本、俄国、西班牙、荷兰、法国、丹麦、瑞典。19世纪中叶，美国是中国棉布的主要买主。1819年，销往欧美的棉布达3395.9万匹，价值170余万元。

黄道婆遗爱600年，江南繁盛600年。但是，到后来，棉花之利，利不在民，而在封建统治者。也由于黄道婆所革新的工具和传授的工艺，只是一种手工操作的工艺，在600年间一直处于几乎是静态之状，最终被日新月异发展的外国科技所击败，被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击败，到民国期间，江南走向式微。这就令人无不为之悲愤交加了。

（作者单位 海南省琼海市广播电视台）

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不少倦。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家。

— 王逢《梧溪集》卷三



海南黎族的腰踞机 (摄影/詹贤武)



三亚天涯海角黄道婆塑像 (摄影/詹贤武)



海南黎族姑娘在染线 (摄影/王静)



上海黄道婆祠 (摄影/王静)